＜尔雅＞词汇形式证明汉语曾是多音节词语言 *

江荻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要]：这篇文章比较《尔雅》前 3 篇普通词汇和后 16 篇名物词音节结构形式，并通过论证名物词具有专有名词性质，提出名物词具有较强的抗音变能力。至战国末期，汉语普通词汇基本都已单音节化，并逐渐走上复合词化道路，而名物词则变化缓慢，仍然保留大量多音节词汇。名物词还表现出南亚语那种次要音节变化现象，符合‘抑扬格’（或‘一个半音节’）词结构演化理论。文章对《尔雅》名物词最多的“草木虫鱼鸟”五篇做了详尽统计，揭示了被释词和训释词所反映的早期（或远古）汉语从多音节词转变为单音节词的依据。

关键词：名物词，个体专有名词，词音节形式，单音节词化

一 〈尔雅〉的单音节和多音节词汇

历代研究者都注意到《尔雅》被释词和训释词的词形差别，包括单音节词、多音节词和叠音词，其中“释训”篇的叠音词尤为显著。杨树达撰《尔雅略例》说“释诂列举单文，释训尽胪骈字。”[1]虽准确却不全面，因为“释草、释木、释虫”等篇还有大量既非“单文”又非“骈字”的多音节单纯词和复合词。

《尔雅》是先秦时期一部词书性质的专书，其内容是对词语加以训释，正如王国维(1916)所说：“物名有雅俗，有古今。尔雅一书，为通雅俗古今之名而作也。其通之也，谓之释。释雅以俗，释古以今。”[2]这段话完整道出了《尔雅》的性质。

《尔雅》共计 19 篇，前 3 篇“释诂”、“释言”、“释训”注解普通词语，后 16 篇解释“特殊语词”。[3]正是这种差别引起后世在事物的分类、词语的形式、认知的范畴各方面的研究，形成“尔雅学”。[4]譬如杨树达针对《尔雅》的词语命名，提出名物受名是“事相近则其受名之故亦相近矣”。[1]本文视角也落在这种差别上，但关注不同词汇的词形历史动态变化。

《尔雅》“释诂”相互匹配的被释词和训释词 177 组，双音节被释词仅 10 组 16 项（权舆、黄发/齯齿/鲐背、亹亹/蠠没、缉熙、暀暀/皇皇、藐藐/穆穆、关关/噰噰、覭髳、毗刘、栖迟），其中还包括部分叠音词，训释词基本都是单音节词或描述短语。“释言”被释词 280 组，仅两项双音节词（庶几，恺悌），占 0.7%，训释词只有一项双音节形式（“畯，农夫也”），仅占 0.36%。这个现象相当地充分说明先秦汉语所具有的单音节词性质。

然而我们看到另一个令人惊讶的现象，《尔雅》后十六篇的训释面貌完全不同。以词数较多的“草木虫鱼鸟”五篇为例来观察，统计数据与前 3 篇悬殊。

表 1. 《尔雅》“草木虫鱼鸟”篇词形统计

			单音节词		多音节词				多音节词总计	
被释词	总数	计数	单音节词	比率	单纯词	比率	复合词	比率	复音词	比率
释草	198	198	166	83.84	26	13.13	6	3.03	32	16.16
释木	87	87	71	81.61	8	9.20	8	9.20	16	18.39
释虫	64	63	32	50.00	27	42.19	4	6.25	31	48.44
释鱼	32	32	25	78.13	6	18.75	1	3.13	7	21.88

---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31271337)，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ZD174,10&ZD124)，中国社科院重大项目(YZDA2011-18)。初稿承覃远雄教授指正。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姜仁涛提供电子版《尔雅》同义词词表，本文据原文有所增补。本文曾在 2012 演化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宣读(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11.9)。

释鸟	71	71	39	54.93	24	33.80	8	11.27	32	45.07
训释词	总数	计数	单音节词	比率	单纯词	比率	复合词	比率	复音词	比率
释草	198	198	40	20.20	79	39.90	79	39.90	158	79.80
释木	87	83	23	26.44	16	18.39	44	50.57	60	68.97
释虫	64	63	8	12.50	36	56.25	19	29.69	55	85.94
释鱼	32	32	12	37.50	9	28.13	11	34.38	20	62.50
释鸟	71	70	12	16.90	29	40.85	29	40.85	58	81.69

这五篇被释词和训释词有四类对应形式：(1)单音节被释词对单音节训释词，例如“魵，鰕”，“鮅，鱒”，“魴，魾”，“鮤，鮆”，“粢，稷”，“众，秫”。（2）单音节被释词对多音节训释词，其中训释词又分单纯词和复合词两类，（2a）单纯词，例如“蜚，蠦蜰”，“鮥，当魱”，“鳭，鶅鸈”，（2b）复合词，例如“荼，苦菜”，“鶾，天鸡”，“鷽，山鹊”，“鷚，负雀”，“楙，木瓜”。（3）双音节被释词对双音节训释词，两者或者是（3a）单纯词，或者是（3b）复合词，例如 “蝙蝠，服翼”，“鸤鸠，鴶鵴”，“戎叔，荏菽”，“洧灌，茵芝”，“蕲茝，蘪芜”，“鱊鮬，鱖鯞”，“鵹黄，楚雀”，“瘣木，苻婁”。（4）双音节被释词对单音节训释词，例如“唐棣，栘”，“常棣，棣”，“蟋蟀，蛬”，“蝗螽，蠜”，“蝤蛴，蝎”，“鵱鷜，鵝”，“舒凫，鶩”，“桃蟲，鷦”，“巂周，燕”，双音词也分单纯词和复合词。

针对这四类现象，统计方法先按照被释词与训释词分别统计，统计对象区分单音节词和多音节词（复音词），多音节词再分为单纯词和复合词。表中总数和计数可能不一致，有些因为条目有被释词而没有训释词，有些则有多项训释词。前者如：“栎，其实梂”，没有“栎”的训释词。后者如：“莫貈，螗蜋，蛑”。对于被释词，“释草、释木、释鱼”三篇的单音节词比率远高于多音节词，另外两篇“释虫、释鸟”也稍高于多音节词。对于训释词，情况完全相反，各篇的多音节词都远远高于单音节词。也就是说，被释词基本是单音节词，平均占69.7%，训释词基本是多音节词，平均占75.8%。这也是单音节词跟多音节词的比率。

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前3篇的被释词和训释词很少有多音节词，后5篇多用多音节词？为什么后5篇多音节训释词的比率远高于多音节被释词？以通行的观点看，被释词多为古词、方言词，训释词为今语或通语。这是否意味着汉语词形结构从单音节扩展为多音节？[5]

回答这几个问题需要更细微的观察，对第一个问题，我们分析推测，前3篇和后5篇词汇音节长度上的差别很可能与被释词的词汇类别有密切关系，前者被释词基本属于普通词语，即所谓抽象概念、属性、状态、时空、行为动作等词语，后者是表示有一定数量集成并相互区别的具体事物，训诂学家称为名物词。对第二个问题，《尔雅》时代，被释词和训释词都可能来自不同语言或方言，大量口语词进入书面语，也有语言词汇历史发展变化因素，例如复合词逐渐丰富。本文尝试在下面逐步解答这几个问题。

二 名物词的性质与演化形式

《尔雅》前3篇“释诂”、“释言”（“释训”多为叠音词，另论）的词汇基本表示抽象概念、属性、性状、时空、行为动作，这类词汇在语言中都属于语用频率较高的词。为集中讨论主题，根据有关研究[6][7]，我们假定汉语这类词是最易单音节化的词，在甲骨文时代大多已经成为单音节词。以下主要讨论后5篇（代表后16篇）的词汇。

“草木虫鱼鸟”等篇所收词语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1)类属共性。“草木虫鱼鸟”所指都是某类事物的个体，一个类属可能有数个、数十个或数百个具体个体，例如“木”类事物有71个具体事物，“鱼”类有32个具体事物。前者的个体都具有“木”的类属共性，后者都享有“鱼”的类属共性。(2)个体专名。比较不同具体事物，每个个体事物的命名都是不同的，代表人对具体事物的认知区别。这就是说，一个具体事物只有一个名称（惟一性），使这个名称具有专有名词的性质。(3)历史特征。一个具体事物有两个或更多名称，这正是

《尔雅》以今语和通语释古语和方言的特点，总起来看是社会变迁和语言发展造成的。

按照第一个特征，“草木虫鱼鸟”等篇的词语是个体名词，都可以用个体量词修饰（或计量），例如“一条‘螼蚓’”（<螼蚓，豎蚕），“一只‘蟋蟀’”（<蟋蟀，蛬）。而按照第二个特征，这些词语又具有专指名词性质，即带有类属特征的专有名词。例如“蟔，蛅蟴”是虫属中的某种毛虫，“蜭，毛蠹”则是虫属的另一种毛虫。

现代语言学名词分类一般把“螼蚓”、“蟋蟀”归为个体名词，指能与个体量词结合的名词。但是我们看到，这些个体名词可以按照人们对事物的分类归属到更大的类，例如“虫”属，可是这个貌似高层次分类（上位概念）的“虫（昆虫）”也可以跟个体量词结合。这似乎会引起认知上的矛盾。原来这里糅合了两个分类原则，与量词结合是语法原则，分层次是事物概念或语义原则。我们分别讨论。

汉语名词与个体量词结合在语法上呈限定或修饰关系，量词是限定语，名词是被限定语或者中心语。通常情况下，名词具有多重属性，这些属性在具体语境中需要通过限定语或修饰语予以凸显。凸显的方法是借助限定语或修饰语的显性值来提取被限定语或被修饰语的属性。例如，“一条‘螼蚓’”通过“条状”属性值提取“螼蚓”的形状属性，并凸显了“螼蚓”的这个属性。同样，“虫”也具有多重属性，同样可以用量词属性值提取，“一只虫”。在个体量词限定的语法层面上，“虫”跟“螼蚓”、“蟋蟀”的语法功能是等同的。

对事物的分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范畴化过程，相似的事物会按照原型范畴聚类，每一个聚类自身也会有一个名称。前者如“鳺鴀、鶻鵃、鴶鵴、鵧鷑、王鴡”，后者如“鸟”。再以提出“家族相似性”理论的维特根斯坦所举案例来看，棋类，纸牌，球类，奥林匹克竞技构成一个相似关系网络（原型范畴聚类），这个关系网络的名称叫作“游戏”。[8]显然，范畴聚类中的个体事物名称与聚类名称存在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这是认知分类中常见的现象。范畴聚类中的个体有相同的属性，也有不同的属性，相同属性越多的事物越具有该范畴的原型性，而作为范畴的称名名词则一般包含了该范畴最多的属性。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尔雅》“草木虫鱼鸟”中的词都是专指的，在属性值上都具有专有名词的惟一性特征，这个特征是为了跟其他相似事物的名称区别而产生的。对于这些需区别相似事物产生的惟一性指称，且受个体量词修饰的名词，可以叫做个体专有名词。另一方面，表示原型范畴聚类或类属共性特征的名词则情况复杂，如果这个名词不再属于另一个分类系统的组成部分，那么这类名词可称为类属名词。类属名词仍然可以用个体量词提取属性值，但在概念分类系统中却是孤单的。例如“（昆）虫”在科学分类上可以跟其他门类物种归入节肢动物门或更上一层的动物界，但是一般认知分类中该词却很难与其他名词构成聚类（或原型范畴），这种孤单性在日常分类中非常明显。

类属名词不具专指性，能跟个体量词结合，因此是个体名词。个体名词跟个体专有名词区别在于范畴聚类的个体数量。以昆虫为例，世界约有100余万种昆虫，每种昆虫名称都是专指的，以区别他种昆虫。个体名词或类属名词则是泛指的，例如：身体，礼物，森林，书，河，神仙，领袖。有些个体名词的孤单性非常明显，但又不同于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的排他性，例如：花纹，鬼，五官，手术。这些个体名词只能依靠临时组合短语来扩展范畴聚类个体的数量，例如，轮胎花纹，复古花纹，木质花纹；外科手术，近视手术，大手术等。总之，个体专有名词的专指性来自区别群体相似事物，但它本身仍然是一个类（type），可以包含不加区分的例数（token），这也是它可以添加个体量词而作为类例（type-and-token）的专有名词不能的原因。附带补充的是，如果一个范畴的类属名词成为另一范畴的组成个体，那么这个名词仍然可以看作个体名词。例如，“学校”是“小学、中学、大学”等的类属名词，但还可以是“单位”的组成个体（学校、工厂、商店、医院等）。

讲清楚了“草木虫鱼鸟”中词的性质，也就不难理解它们跟前3篇词的词形差别。我们曾指出人类语言词形发展的五个阶段，其中东亚语言尤为特别，从多音节发展为单音节词形

语言[9]，并早在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基本完成单音节化过程[10]。《尔雅》前 3 篇的词语就是在这个演化浪潮中产生的，几乎都是单音节词了。反之，《尔雅》“草木虫鱼鸟”篇的词基本都是性质不同的“名物词”，所谓名物词古代最早指自然界的生物名称，后来扩展到其他事物，如天文、地理、建筑、衣物等。关于名物词的性质，《荀子・正名篇》说：“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推而别之，别则有别，至于无别然后止。”[11]这话说的是，列举事物要有名称，鸟兽是大名称，之下又有小名称，不断细分名称直到不能再分。这里的“别”显然是分类，分了又分则有“专名”的意思。所以，陆宗达和王宁指出“从词义学的观点来看，名物讲的是一些专名的词义。这种专名的特殊性在于，它所指的对象范围比较特定（就概念来说就是外延很小）而特征比较具体（就概念来说就是内涵较大）。”[12]

陆、王两位先生的分析虽然跟本文的论证方法不一样，结论却一致。我们知道，专有名词的演化往往徘徊在普通名词之外，有抗演化性质。既然名物词具有专有名词的性质，即个体专有名词，因此不易变化。这就是为什么《尔雅》前 3 篇与后 5 篇词形长度差异的原因所在。这一节的结论是：《尔雅》名物词是商周先秦中国民族大融合和汉语结构大演变过程中演化和不同程度保留下来的多音节词形。

三 汉语演化方向是从多音节词到单音节词

《尔雅》作为义类词典，其选词立目必有依据，这种依据应该来自更早期多种文献。胡奇光和方环海曾提出判断《尔雅》年代的部分文献，例如《尸子》、《吕氏春秋》、《山海经》、《穆天子传》、《庄子》等，并指出这些文献也正是《尔雅》词条的部分来源。[13]可以推测，词之所以要训释是因为有社会语用的实际需求，或者因为不易理解，或者需要规范，于是形成了被释词与训释词的各种关系。由于语言和词义的变化，后世对二者的关系有不同解读，例如胡朴安认为“其释诂、释言、释训三篇，大概以今语释古语，以通语释方言。”“释训以下诸篇，名物之释，以俗名释雅名，历有声韵之关系。”[14]也就是说，前 3 篇涉及古语和今语，通语和方言问题，后 16 篇涉及俗语和官话问题。根据历史，商周以降至战国末年约 1300 余年，是中国社会大融合时期，我们认为先秦各国语言无论是否汉语，分别吸收了大量非汉语成分，随着社会融合，各地语言或方言都可能采用汉字记录，一定存在大量非汉语官话词汇，再加之汉语本身也发生巨大变化，这也是《尔雅》产生的原因。

上文讨论了“草木虫鱼鸟”篇被释词和训释词的四类词典形式，这里从结构数量进一步细化被释词和训释词的词形对比状况。表 2 对《尔雅》四种词典形式又按照被释词和训释词的对应做了分析，获得 9 种类型。表中 m 表示单音节词（monosyllabic words），p 表示多音节词（polysyllabic words），c 表示复合词（compounds），因此 m-p 表示用多音节单纯词训释单音节词，p-c 表示用复合词训释多音节单纯词，余类推。

表 2 《尔雅》“草木虫鱼鸟”被释词与训释词对比数据

			单音节被释词-单音节训释词		单音节被释词-多音节训释词				多音节被释词-单音节训释词			
	被释词	训释词	m-m	%	m-p	%	m-c	%	p-m	%	c-m	%
释草	198	198	36	18.2	60	30.3	70	35.4	3	1.5	1	0.5
释木	87	83	20	24.1	14	16.9	35	42.2	3	3.6		
释虫	63	62	4	6.5	18	29.0	10	16.1	4	6.5	6	9.7
释鱼	32	32	12	37.5	3	9.4	10	31.3				
释鸟	71	70	5	7.1	14	20.0	20	28.6	3	4.3	4	5.7
			多音节被释词-多音节训释词								m-p 和 p-p 合计	
	被释词	训释词	p-p	%	c-c	%	c-p	%	p-c	%	m/p-p	%
释草	198	198	19	9.6	5	2.5					79	39.9
释木	87	83			6	7.2	2	2.4	3	3.6	14	16.9

释虫	63	62	16	25.8	3	4.8	1	1.6			34	54.8
释鱼	32	32	5	15.6			1	3.1	1	3.1	8	25.0
释鸟	71	70	13	18.6	1	1.4	2	2.9	8	11.4	27	38.6

具体来说，被释词与训释词之间主要存在两类现象，被释词多是书籍记载的古语词、他地方言词、非汉语词（或历史上借入并融于汉语的外来词），一般不是当时的常用词，而训释词则是作者所知通行的“官话”词和口语词（或通行俗语），或书面上的“雅词”。例如“载，岁也”，“鰝，大蝦”。另一类被释词与训释词的关系是历史上形成的同义词或异名词（不究来源），当时都还使用，例如“卉，草”，“荷，芙蕖”。至于利用文字训读和音训的在后 16 篇不多见，例如“矢，誓也”（假借，释言），“于，於也”（古今字，释诂），“茨，蒺蔾”（释草），“倉庚，商庚”（释鸟），“藒車，芞輿”（释草）。这类现象我们不单独论述。[15]

这两类现象在结构和词形上表现了哪些特点呢？从“草木虫鱼鸟”分篇数据来看，m-c、m-p、p-p 三类都达到最高值，m-m 也比较多。m-c 为什么数量高呢？从实际案例看，绝大多数来自组词描述，例如，“藫，石衣”，“芨，堇草”，“楔，荊桃”，“蜺，寒蜩”，“蟓，桑蠹”，“鷚，山烏”。这正是汉语先秦以后复合构词的基本路线。m-p、p-p 高数据则意味着多音节单纯词当时是名物词的主体，它们是当时汉语中常用的词形。少量 c-p 形式则表示有可能部分词已经发展了复合词形，但仍然与多音节单纯词同时使用，而且多音节单纯词用作训释词说明它们的历史常用地位，例如“瘣木，苻婁”，“土螽，蠰溪”，“蚹蠃，螔蝓”，“鼯鼠，夷由”。当然也有 p-c 这类新造词的结构，例如“莿甄，豕首”,“蘮蒘，竊衣”（释草）,“螟蛉，桑蟲”（释虫），“桑扈，竊脂”，“鵽鳩，寇雉”（释鸟）。m-m 有多种情况，有些可能来自不同方言或语言，有些是同类之一种，还有省略形式或者异体字造成的，例如“蒤，蔨”（释草），“椅，梓”（相似同类，释木），“螫，蟆”（之一种，释虫），“鮂，鰍”（释鱼），“鷲，鶅”（鸕鷲省，释鸟）。“萍，荓”（异体字，释草）。图 1 反映了“草木虫鱼鸟”各篇词语数据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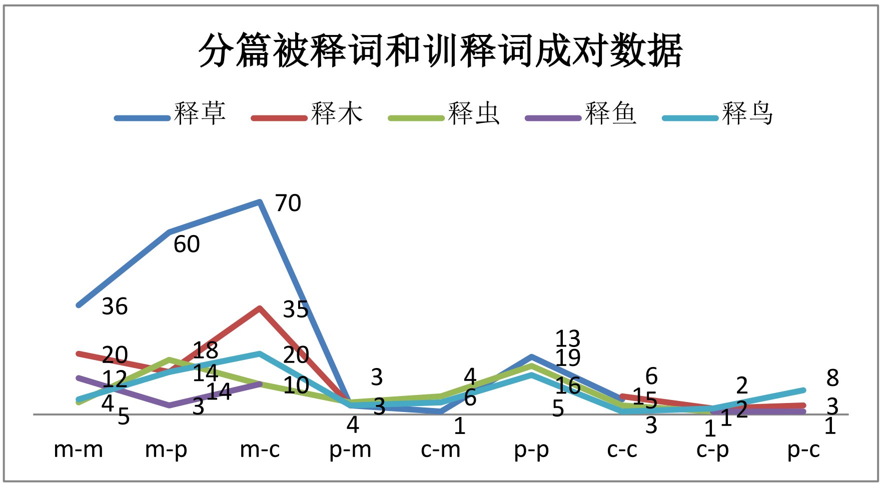

图 1：

第一节中表 1 的数据显示，被释词单音节词数据高于复音词数据，而训释词复音词数据远高于单音词数据（参见图 2），这正是第 1 节提出的汉语词形演化方向问题：汉语词形结构是否从单音节扩展为多音节？不过，如果我们把表 1 数据继续细化，又会呈现另一番图景。

被释词和训释词复音词都包含了多音节单纯词和复合词，现在把这两部分切开，比较二者所占比率（%）。先看复合词，释草（被释词∶训释词）：3.03∶39.90，释木：9.20∶50.57，释虫：6.25∶29.69，释鱼：3.13∶34.38，释鸟：11.27∶40.85。被释词的复合词比率极低，甚至只有训释词的数十分之一，说明这些词是早期产生且不常用的偏僻词，而训释词数据也说明战国秦初汉语复合词有了较大发展。再看多音节单纯词，为了比较，括号内列出单音节词被

释词与训释词的比率。单纯词，释草（被释词:训释词）：13.13:39.90（单音节词：83.84:20.20），释木：9.20:18.39（81.61:26.44），释虫：42.19:56.25（50.00:12.50），释鱼：18.75:28.13（78.13:37.50），释鸟：33.80:40.85（54.93:16.90）。被释词的比率普遍低于训释词，与单音节词完全相反，这个现象令人困惑。上文已经指出，多音节名物词是汉语抗演化较强的历史遗留现象，我们还知道，多音节单纯词不是汉语新词产生方式，这种现象只能说明它们是口语系统中原有的词汇，无论早期文献是否记载，它们都是存在的。至此，我们回答了上文提出的问题，否定了原始汉语词汇结构从单音节扩展为多音节的猜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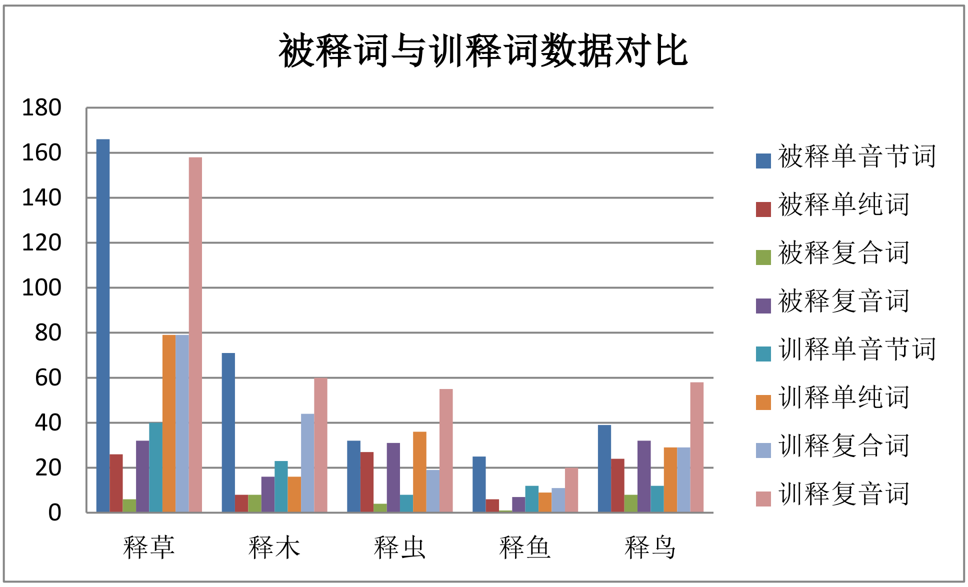

图 2：按照被释词和训释词词形类型统计数据图

四 结论：甲骨文时代以前的汉语是多音节词语言

国人大多认为汉语从甲骨文以来是单音节词语言，这一结论按时期论未必有错。但是，遗传人类学从基因科学角度提出现代人起源于非洲的命题，[16]这些带着语言走出非洲的现代人逐步扩散到世界各地，语言也分化开来。把汉语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思考，世界范围内惟包括汉语在内的东亚和东南亚语言属于单音节词语言，这就需要深究了。

汉语从多音节词演化为单音节词的机制是什么呢？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南亚语学者 Shorto 就发现了南亚语的弱化首音节（也称次要音节，一个半音节）现象，即多音节词的词根主音节前所带元音极度弱化的音节，并定义为“除伴生元音（anaptytic vowel）外不带元音的音节”。[17]后来，Brunelle 认为 Hayes 提出的抑扬格-扬抑格定律符合东南亚语言的实际，[18][19]该区域语言的普遍趋向是抑扬格词系统向单音节系统演化。潘悟云、陈洁雯等人认为汉语也存在类似的次要音节演化现象，[20][21]江荻论证了藏缅语中达让语的弱化首音节变化现象。[22]

如果假设早期汉语是多音节词语言，那么汉语词汇词形结构至迟在甲骨文时代已经基本完成单音节化过程。我们推测，东亚区域在新石器时代至夏商周期间发生的民族大融合推动了语言的大融合和大演变，汉语在这个时期发生了词形结构的激烈变化，由多音节结构转变为以单音节结构为主的语言。幸运的是，还有一些词汇保留了早期多音节词形结构，帮助我们探源，例如《尔雅》所收名物词。

在以上讨论中我们还留下了一个未探讨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草木虫鱼鸟”篇中代表早期形式的单音节被释词有那么高的比率？我们认为即使名物词比之普通词不易变化，也不能抗拒历史音变的力量，会不同程度地丢失弱化首音节。例如“苊，蒫苊”，“苕，陵苕”，“葋，蚪葋”（释草），“杞，枸檵”（释木），“蜩，蜋蜩，螗蜩”，“蠖，蚇蠖”，“蠓，

蠛蠓”（释虫）。按照分析，“苨，菧苨”这个“菧”就是弱化音节，郝懿行《尔雅义疏》说：“菧苨，荠苨，亦以声为义。”表明“菧”读音不稳定，或者在不同方言中已发生变化，有些读作“荠”。又：《本草经》也作“荠苨”。再以“蜩”为例，《尔雅》平行用了“蜋蜩”和“螗蜩”训释，《方言》说：“蟬，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螗蜩，陳鄭之間謂之蜋蜩，秦晉之間謂之蟬，海岱之間謂之[虫奇]。”这说明“蜋”和“螗”读音可能是方言差别，也是音变造成的，“蜩”则是前面弱化音节脱落造成的。至于“馬蜩”、“寒蜩”、“茅蜩”则是复合构词产生的。这是《尔雅》时代被释词中单音节名物词数量较多的原因。

除了被释词为单音节的，也有被释词为多音节词，训释词为单音节词，例如“唐棣，栘”，“常棣，棣”（释木）。清人刘宝楠《论语正义》认为“以棣之名專屬唐棣，而以常棣爲棣之類。若然，則此注所云‘唐棣栘’，‘栘’字亦‘棣’之誤矣。”况且许慎《说文》也是“栘，常棣也。”因此，刘宝楠提出“《論語》疏引‘唐棣’，必是‘常棣’之誤。”这场争论本质在于“唐”和“常”无非是汉字记录的一个弱化音节，读音不稳，而且可脱落，所以作者方言所采用的训释词已经脱落了次要首音节。这是有些被释词为多音节词而训释词为单音节词的原因。

总之，《尔雅》名物词词形结构揭示了远古汉语跟世界其他语言一样，是单纯多音节词语言。由于词汇性质不同，当普通词汇单音节化之后，名物词则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多音节现象，即直到战国末年汉语日常口语中仍然保留了大量多音节单纯词，而那些单音节化的普通词汇又逐步走上了复合化的多音节结构道路。这个过程一直延续至今，对汉语语音词汇语法各方面都造成显著的影响。[6]

参考文献

[1]杨树达.尔雅略例[A].积微居小学述林[C]241 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2]王国维. <尔雅>草木虫鱼鸟兽名释例[A]. 观堂集林[C],(1916)106-9.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3]顾廷龙,王世伟.尔雅导读[M].成都:巴蜀书社,1990.

[4]李法白.尔雅释词撮例[J].郑州大学学报[J],1963,(4).

[5]赫迈莱夫斯基-亚努士. 上古汉语里的双音词问题[J].中国语文,1956,(10).

[6]江荻. 音节型语言演化的后果. 人类学通讯[J],2011:(5):255-262.

[7]江荻. 人类语言基因的演化和世界语言词形多样性.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演讲(2012.5.18),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报告日’演讲(2012.6.13).

[8]维特根斯坦. 哲学研究[M]p47.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9]江荻. 语言构拟的高层原则试述.“四川境内藏缅语国际研讨会”宣读(北京大学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中国语言文学系主办，2010.10.22-26).

[10]江荻.王念孙的联绵词‘天籁’说证.当代语言科学创新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暨<语言科学>十周年庆典会大会演讲(江苏师范大学,2012.10.27).

[11]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 荀子新注[M].p372,北京:中华书局,1979.

[12]陆宗达,王宁.训诂与训诂学[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4.

[13]胡奇光,方环海.尔雅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14]胡朴安.中国训诂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

[15]徐朝华.尔雅今注[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

[16] Jin, L. & Su, B. Natives or Immigrants: Origin and Migrations of Modern Humans in East Asia[J]. *Nat Rev Genet* 2000:(1):126-133.

[17]Shorto, H.L. The Structural pattern of northern Mon-Khmer languages[A]. In H.L. Shorto (ed.), *Linguistic Comparis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Pacific*[C], pp 45-61. 1963.

[18]Brunelle, M., Pittayaporn, P. Phonologically-constrained change: The role of the foot in monosyllabization and

rhythmic shifts in Mainland Southeast Asia[J]. *Diachronica*, 2012:(29):4:22p.

[19]Hayes, B. Iambic and trochaic rhythm in stress rules. Niepokuj, N., M. VanClay, V. Nikiforidou, & D. Jeder (eds.), *Proceedings of BLS 11: parasession on poetics, metrics, and prosody*. BLS, Berkeley, 1985. p.429-446.

[20]潘悟云. 汉藏语中的次要音节[A]. 中国语言学研究的新拓展[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21]陈洁雯.上古复辅音声母:粤方言一个半音节的字所提供的佐证.方言,1984,(4).

[22]江荻.达让语的抑扬格词模式演化特征。第 6 届国际彝缅语学术研讨会宣读(2012.11.2-4,西南民族大学).

[作者简介]江荻，男，湖南长沙人，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汉藏语言学和藏语计算语言学研究。

JIANG Di, Chinese was a Polysyllabic-word Language Proved by Er-Ya Vocabulary

Abstract: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word-forms between vocabularies of the first 3 volumes and the last 16 volumes in classical document <ErYa>, the former of which are common words, and the latter of which are Mingwu words. By proving Mingwu words are qualified as proper nouns, we put forward a new point of view that the Mingwu words are stronger in anti-changeable than common words. Until the end of Warring States Period in China, Chinese common words nearly all monosyllabized and most of Mingwu words still changed slowly. Chinese Mingwu words are the same as minor syllabic words of Austroasiatic languages and some Tibeto-Burman languages, which evolve according to the iambic pattern. The paper reveals the evidences of monosyllabisation of different words by computing the quantity index number in ErYa.

Keywords: Mingwu words; special proper nouns; word-syllabic forms; monosyllabisation